

周而复始，贯穿了他的一生，使他承受着无比的压力，却又永不言弃。

傅聪的真，体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，也体现在他为人处世上。他从来不会敷衍伪装，也从来不说假话。《傅雷家书》于1981年初版，1984年增订版中，收编了我翻译的十七封英文信及六封法文信。虽说只有二十来封书信，当初接手这任务时，也的确战战兢兢，不敢掉以轻心。毕竟这是翻译大家傅雷的家书，要讨论傅译容易，要着手译傅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必须通读全书，细心体会，悉力揣摩傅雷的文风，才能把他的英法文还原成中文。所幸这一次的尝试，得到了傅聪的嘉许，他说：“你翻译的家书，我看起来，分不出哪些是原文，哪些是译文”。他的这句话，是我这辈子从事翻译工作所得最大的鼓励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直到今天。1996年，傅聪重访波兰，发现了当年傅雷致傅聪业师杰维茨基教授的十四封法文信，这批信又于次年交在我手上。信中的措辞是非常谨慎而谦恭的，礼仪周到，进退有据，因此翻译时需要格外小心，以免不符傅聪的要求。这批信是参考傅雷致黄宾虹书信的体裁翻译的，完稿后傅聪说：“啊呀！怎么你还会文言文啊？”一句肯定，就将所有的辛劳一扫而空。1999年梅纽因去世，遗孀狄安娜夫人将一批傅雷当年写给亲家的法文信件交还傅聪，这批信件内容丰富，除了涉及两家小儿女的闲话家常之外，也包含了不少对人生的看法及对艺术的追求等严肃的话题。收到这第三批信时不由得心中琢磨，家书用白话来翻，杰老师的信用文言来译，这批信又该如何处理？就

用文白相间的体裁吧！谁知道初稿完成后，傅聪一看并不满意，他不会客气：“这语调，又不文又不白，怪怪的！”结果，我得努力揣摩傅雷致友人如刘抗等人的书信，以一松一紧，骈散互济的方式，取得了文白相糅的平衡，九易译稿之后才拿给傅聪看，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。

傅聪最讨厌的是虚伪客套。1983年，香港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给他，我应邀观礼。典礼之后，在茶会上一大群人围着他索取签名合照，令他不胜其烦，结果他干脆谁也不理，索性避开了人群，拉着我躲到一个角落，悄悄问我，过一阵要去见一个什么闻人，那人到底怎么样？说时像小孩怕见大人似的，一脸尽显童真。

对傅聪来说，俗套的仪式，例如众人聚集在公众场所高唱生日歌教他受不了，一堆乌合之众不分是非黑白的群体愚昧更让他深恶痛绝！然而在私人的场合，谈得来的朋友之间，他是毫无保留，真情流露的。有一回，在晚餐后同往酒馆聊天，饭饱酒酣中，他忆起了少年往事，说到十七岁时从昆明返回上海，沿途历经一月，困难重重，不知接受了多少善心人士的义助，才得以返家，说到激动处，不禁热泪纵横，难以自抑！当然，多年相交，开心见诚时，也曾看过他最真诚，最坦然，如赤子一般的笑容，连他自己也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

儿哭哭啼啼，没有这回事，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！”（见《与郭宇宽对话》）

## 以最佳的演出向父亲致最深的怀念

1989年中，当时我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，想到再过两年就是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，也是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了，何不邀请傅聪来举行一场傅雷纪念音乐会筹募基金，以推动翻译事业？话虽如此，学会是个毫无资源的民间学术机构，怎么请得起钢琴大师傅聪呢？这事必须他答应义演才行。于是，硬着头皮，鼓起勇气，写信征求傅聪的意见。1990年初，傅聪来电，表示1991年他决定来港演出纪念音乐会，义助香港翻译学会募款。当时一听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喜的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意念，原本有点像天方夜谭，居然得以如愿；惊的是自己虽喜爱音乐，但毕竟不是内行，要在无兵无将无财力的情况下去筹办一场募款音乐会，简直有点不自量力。但是为了不负傅聪的信任，还是决定订下了最大的场地文化中心音乐厅，并坚持楼上楼下2019个座位齐开，以期达到最盛大的效果。为了配合音乐会，我们同时举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展览会，将傅雷生平的手稿、家书、生活照片等等

那些天，他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在音乐上，誓要以最佳的演出向父亲致最深的怀念。